

**Rational Ecology of University and Nation:
from University Phylogeny in Europe and America**
**L'écologie rationnelle de la relation entre l'université et l'Etat vue
sous l'angle de l'histoire du développement des universités
européennes et américaines**

從歐美大學的發展史看大學國家關係的合理生態

Pang Jinwei

龐晉偉

Received 6 August 2005; accepted 28 October 2005

Abstract relation of university and n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university's active role in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human. Approach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them was searched from university came into the world in Europe and America. Rational ecology of university and nation in favor of reasonable development to society, it includes three aspects: the essential pursuit of freedom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and individual; establish laws to protect academic freedom and academic autonomy; university cares nation's development.

Key words: university and nation, university duty, ecology

Résumé La relation entre l'université et l'Etat constitue un facteur important qui influence l'université et promeut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société et l'homme. Depuis leur fondation, les universités européennes et américaines cherchent à trouver la voie permettant à l'université et à l'Etat de développer harmonieusement. Poursuivre principalement la liberté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l'homme et de l'humanité, établir des lois protectrices de l'autonomie et de la liberté académiques, les universités suivent de près le développement de l'Etat, tout cela permet la formation de l'écologie rationnelle entre l'université et l'Etat et fait progresser le développement scientifique de la société.

Mots-clés: l'université et l'Etat, les responsabilités universitaires, l'écologie

摘要 大學國家關係是影響大學促進社會和人的發展的重要因素，歐、美大學自誕生開始，就試圖找到使二者和諧發展的途徑。以人和人類的自由與發展為核心追求，建立保護學術自治與學術自由的法律，大學關注國家的發展，有利於大學國家合理生態的形成，從而推動社會的科學發展。

關鍵詞: 大學與國家；大學責任；生態

現代大學承擔著培養的責任、教學的責任、指導的責任、服務的責任、研究發現的責任、學術成果發表的責任、誠實的責任、技術轉讓的責任以及社會變革的責任。這些責任彙集成大學對於人類社會發展的責任。大學與國家關係是影響大學這一使命的重要因素，合理的生態關係有利

於人類社會的發展。

1. 西方大學與國家關係的歷史回顧

大學作為獨立的社會機構，現在比較首肯的

觀點是源于中世紀的大學。中世紀的大學起源于自發組織起來的教師、學者行會，目的是為了探討與學習高深學問。這個獨特的功能使得大學與當時教會、國家之間形成了一種較為默契的關係：教會、國家依靠大學研究的學問與培養的人才，鞏固已有的地位；大學則通過教會與國家的政治庇護與財政支持，取得延續、發展與壯大。因此大學從教皇或國王那裏獲得了包含種種特權的“特許狀”，學術自治與學術自由是最核心的內容，即大學享有自主決定和管理內部事務的權利。但中世紀大學的教育內容受宗教影響比較明顯，神學是大學教育的重要內容。

宗教改革和科技革命改變了這一局面，打破了這種平衡關係。

中世紀，在德國教會獨攬著文化和教育的大權，大學與天主教會密切相連。神學是主要的教育、研究內容，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巨大成就還難以進入大學的校門。德國宗教改革推翻了教會的統治，使整個教育制度產生巨大的震盪，導致了教育的衰落，特別是對大學的打擊是具有毀滅性的，舊大學象天主教一樣受到社會的唾棄。

1789年爆發了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新生的資產階級政府把保守的大學全部取消；在英國，大學仍然堅持以博雅教育和人文教育為主，以培養紳士為大學的目標，拒絕自然科學的成果進入大學，大學保持著保守的貴族風格，認為經濟繁榮不需要大學改革。

而與此形成鮮明的對比，國家認為科技革命產生的新技術對於經濟的發展有重大的作用，事實上以蒸氣機為代表的科技革命有力地推動了英國經濟的發展，借助科技的發展，英國一舉成為當時世界上的經濟大國和經濟強國。出於對國家發展的追求，國家希望科技革命的成果能夠進入大學，成為大學教育的內容。但大學並沒有對此作出積極的回應。

因此有教育學者指出：“大學在 18 世紀和 19 世紀早期還處於一種休眠狀態。缺少一種切實的、在知識上的職責，強調傳授已有的文化，嚴格限制發揮社會作用，所有這些都造成了大學發展動力上的不足”。¹

科學不能進入大學，與之相關的科研也遭到大學的拒斥。為了發展和繁榮經濟，英國在工廠中普遍實行學徒制，並廣泛設立職工教育講習所，它們對於英國經濟分發展起到了事實上的作用。歐洲大陸國家的大學對科研排斥的結果，是在大學之外形成了完備的國家科研體系。

國家以經濟的發展來推動社會的發展和變革，大學仍舊保持著穩重的古典風格和自治傳統，認為培養全面發展的個人是大學教育的使命，科學和技術只是求實利的工具，對人的培養是無用的。大學和國家對社會的發展動力在認識和行為取向上發生了分歧。

這一情況在美國要比在歐洲好了許多。

186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莫里爾法案”，法案規定：各州凡有國會代表一名者，聯邦撥地 3 萬英畝，將土地出售，用所得資金建立永久性基金，至少資助一所學院。這些學院被稱為“贈地學院”，“贈地學院”的建立對美國高等教育產生了重大影響，標誌著國家將大學視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開始對大學發展的國家干預；同時以應用型知識為主的高等教育成為一些大學的教育選擇，為社會服務的高校體制在美國建立。

莫里爾法案通過後，贈地學院迅速發展，形成土地贈予運動。其中有 28 個州單獨設置了農工學院；賓夕法尼亞、密歇根、馬里蘭等州則把土地撥給原已設置的農業學校；伊利諾斯州則成立了工業大學，不久改為州立大學；另有 15 個州是在州立大學內添設農工學院。據統計，自 1862 年莫里爾法案開始實施到 1922 年阿拉斯加大學建立為止，美國共創辦了 69 所贈地學院。該數目超過美國州和准州的總數。贈地學院培養工農業方面的高級專業人才，教育物件是一般中下層社會成員，以農民和勞工階級居多。課程包括農業、工藝、軍訓等，也包括古典學科，但古典學科已失去了昔日的支配地位，實用科學受到推崇，鑽研理論而鄙視生產的大學傳統被改變。婦女也獲得了入學的權利。²

“莫里爾法案”催生的贈地學院對社會的發展發揮了深刻的作用，從此，為社會和國家服務成為美國大學的一種核心價值觀；興辦大學、建設一流大學能夠推動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成為美國

¹ 菲利浦·G·阿特巴赫著，符娟明等譯，*比較高等教育*，文化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第 28 頁。

² 陳學飛著，*當代美國高等教育思想研究*，遼寧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年版，第 31 頁。

的一種社會共識。威斯康星思想強化了這一認識。

威斯康星大學校長查理斯·R·范·海斯認為：大學的任務就是：第一，通過各個科學領域知識的擴展和研究人員的系統研究來挖掘知識的實際運用價值；第二，通過科學專家在發展工農業和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等方面作出貢獻，部分通過與大學教師以及政府官員合作；第三，通過大學擴展教育，讓更多的社會成員能接受大學教育。³這一大學發展理念成為威斯康星大學的辦學理想和行為準則，付諸實施後對威斯康辛州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這一思想迅速在美國傳播開來。

在歐洲，19世紀以後因規模增大、複雜程度提高，大學的生存困境日趨明顯；與此同時，國家對大學的干預傾向也越來越強烈，主要是因為大學重要性的不斷增強。企業界迫切要求以大學的科研作為自己擴展實力的後盾。

科學研究從開始作為人才培養的一種手段被引入大學，逐漸被賦予新的意義。知識的發現、規律的揭示、最主要的是科研成果可以直接對經濟的發展發揮作用，這些使得國家對大學的價值越來越重視，大學的政治功能得以再次彰顯。

以科學研究為橋樑，大學和國家對發展的追求再次被溝通。科研在大學中地位不斷提升，它給政府、企業甚至是研究者、大學帶來許多實際的利益。20世紀初期的科學已經發展到相當程度，尤其是物理學和生命科學的發展，對研究設備和其他物質條件的要求越來越高，而大學的科研條件越來越難以滿足這種需求。國家加大了對大學的投入和干預，同時，大學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參與範圍不斷拓展，層次不斷深入。

大學由學者的行會變為國家主辦和管理的教育機構；由宗教性變為世俗性；由中世紀大學的“國際性”轉變為致力於為發展本國政治經濟服務；大學由“象牙之塔”轉變為教學科研結合、直接為社會服務的機構。至19世紀後期，西方各發達國家先後確立了高等教育的國家干預職能，無論是私立大學還是公立大學，都無法置身於國家政府權力的影響之外。國家加強對高等教育控制和影響的後果是：一方面大學更加面向社會現

實，服務於國家的要求；另一方面由於國家的支持和管理，大學獲得空前的發展。

在推動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大學的作用和重要性不斷地被闡釋，新的內容不斷被加入。

1892年，面對中學畢業生升學人數激增的壓力，美國芝加哥大學開始創辦獨具特色的“初級學院”，把大學一分为二，一、二年級為初級學院，三、四年級為高級學院。“初級學院”作為兩年制高等教育機構，其主要任務是普及高等教育和為進入大學本科三年級做準備。到1940年，美國“初級學院”已有469所，在校學生達23.2萬人，成為美國高等教育結構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機構對於美國實現高等教育的大眾化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經濟學家在對導致經濟增長的各種因素進行分析時發現了人力資本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進而推導出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的估算方法，形成了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理論。在西方，舒爾茨被認為是就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做定量分析的第一人。⁴

除了可以通過直接形成人力資本外，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還能夠通過多種管道促進其他部門的生產，如：提高子女的品質；提高家庭內部勞務生產的生產率；有助於改善受教育者本人及其配偶和家庭成員的健康狀況；降低生育率；提高消費者選擇效率；提高勞動力市場雙向選擇的效率；提高婚姻選擇的效率；提高儲蓄率；降低犯罪率；提高社會和諧程度；促進技術進步與傳播；促進社會民主化進程；提高環境品質。

正當人們沉浸於大學、國家和社會蓬勃發展的喜悅中時，一些新的現象開始湧現。因為對經濟發展的偏重，整個社會充滿著功利主義的價值取向，人類社會價值和意義出現失重，社會失序、行為失範現象出現，社會承信出現危機。圍繞經濟發展推行的專業教育，使大學教育的弊端日益顯現出來：過分專業化造成受教育者的“新的片面發展”。⁵受教育者日益成為“單向度的人”、“經濟奴隸”或“經濟動物”。科技越發展，人們越感到精神的空虛、情感的壓抑，甚至

³勞倫斯·A·克雷明著，朱旭東等譯，*美國教育史：城市化時期的歷程（1876—1980）* [M]，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第273頁

⁴Elchannan·柯恩著，王玉昆等譯，*教育經濟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頁

⁵李曼麗，*通識教育——一種大學教育觀* [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第165—166頁。

產生了空前的人倫和道德危機。

國家把經濟的發展作為社會發展的核心甚至是唯一指標，圍繞這一理念調整社會各個機構的價值取向和行為，並借助市場經濟之手促進這一進程。但市場經濟的最終目的是“利潤和收益最大值”⁶物質的發展不能替代精神的進步，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需要對以前的發展觀提出批判。

作為人類精神的瞭望塔，人類文明的家園的大學，與社會經濟的發展應保持適當的距離，因為大學對國家和社會的發展責任決不僅僅只是在眼前，只是去賺錢。洪堡曾在創辦柏林大學時重複當時德國民眾的心聲：國家服務於大學，大學服務於理性的國家。他也曾說：國家不要總期望大學永遠滿足國家的當前需要。

反觀自 19 世紀以來的大學與國家關係的歷史，重經濟發展、重眼前利益是國家對發展的認識；發展實用的科學研究，直接為經濟發展服務成為國家對大學的要求，甚至成為一些大學的主動追求。這給社會的發展帶來了一些問題，大學和國家都試圖思索、找尋更深刻的發展觀，以調整兩者之間的關係。

終身教育理念、閒暇教育理念、素質教育、可持續發展觀、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理念的提出，表明大學對自身使命開始進行重新的反思，表明社會開始對發展的認識越來越深入。在大學與國家關係方面，學術自治和學術自由對於大學堅持對真理的揭示、對社會的責任和對個體發展的責任的重要性重新被社會所認同。

西方發達國家對大學組織的發展嘗試實行有限的干預，對高等教育開始實行“審慎干預和控制”。以保持大學學術自治與國家利益要求之間的協調與平衡，從而推動社會的健康發展。

建立在學術自治與學術自由基礎之上的大學法人地位得到國家的承認。大學在法律上以平等的主體身份介入社會活動中，在社會生活中有行為選擇的自主權。對內可以自我管理大學內部事務，國家對大學的行政管理開始真正地尊重大學的自我管理權。國家對大學的干預和管理的方式及內容也發生了改變。

國家運用法律、政策、資助、計畫、監督和

評價等宏觀性和指導性的間接干預手段對大學的行為取向進行引導，以利益機制引導大學進行組織內部的調適，從而實現對大學發展的干預。大學在社會中自主地選擇自己的行為方式，堅持自身的價值觀，在社會發展與自身發展之間尋求一種平衡，在維護社會價值和維護自身價值之間尋找“雙贏”。從而既為了自身的發展，也為了國家和社會的發展能夠貢獻出大學自身的智慧和價值。之所以有這些變化，是因為國家承認了大學在推動社會發展方面決不能只局限於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大學決不能變為國家發展意志中只會聽話的奴僕，國家也不能向這方面去強求，因為得不償失。大學在承擔國家的發展目標和發展專案時，國家與大學之間是一種平等的契約關係，更加突出大學的自主性。

國家對大學的干預主要借助於廣泛存在政府和非政府機構來完成，國家對大學的干預決策更加審慎。國家每一項高等教育干預政策(包括立法、資助、評估等)的出臺，都是經過廣泛而充分的社會醞釀、討論以至爭論，在民主決策的基礎上做出的。建立了國家各級水準的教育審議制度，以提高國家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信度和效度。完善對大學干預的規範和程式等法律操作的建設和遵循。如美國中央一級設立的政府間教育審議會、聯邦職業教育審議會，英國中央一級設立的中央教育審議會、師資供應教育審議會、全國地方高等教育審議會，德國中央一級設立的科學審議會，法國的全國高等教育及研究審議會以及全國學校配置審議會等，都是國家政府教育決策的諮詢機構。這些機構成員來自於社會的各方面，對於國家將要出臺的對大學的干預政策可以從社會的各方面予以分析，加強了大學發展的可靠性和國家干預的可行性。

一個良序發展的社會需要一大批能夠獨立自主地發展著的大學，因為他們是社會的良心，它們給國家和社會的不是國家和社會想要的(want)，而是國家和社會需要的(need)。在西方現代社會，大學和國家之間在學術自治和有限干預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張力。這種張力既保證了一個社會中一支校正性力量的存在，以利於社會和國家的發展；同時，這種張力也保證了大學能夠充滿時代的活力，活在現實世界中；但這種張力最重要的是保證了人類社會有一個比較可靠的發展基礎。

⁶P·科斯洛夫斯基. 資本主義的倫理學[M].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 第 6 頁.

2. 構建合理的大學與國家關係

大學生命的真諦是自由地追求學術、創造和傳播知識，這既是現代大學的使命，也是現代大學的理念。學術自由是為了促進學術繁榮，進而推動學術發展，為人類社會的長久發展提供智力的支援和知識的保障。學術自由有助於科學發現與真理的探索，最終有助於國家與社會的發展與強盛。

大學自中世紀肇始，歷經幾百年的發展，美國高等教育哲學家布魯貝克把大學存在的哲學依據概括為兩個：認識論和政治論。認識論使得大學有趨於保守和自我陶醉、脫離社會的傾向，但也使得大學能夠堅持用知識的力量來推動社會的發展。政治論使大學的存在獲得現實的合理性，但陷於其中有可能使大學變得世俗化，使社會失去長遠的批判力量和智慧支撐。協調這二者之間的衝突，為我們構建合理的大學與國家關係提供了一個思維路徑。

科學發展觀是追求人和社會和諧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發展觀，它的價值取向和大學、國家的發展取向是一致的。用科學發展觀來分析國家與大學的關係，有利於大學與國家生態關係的自主調適。

以人的發展和人類自由的發展作為大學國家生態關係的核心追求。自問世以來，大學承諾實現人的自由發展，將人的尊嚴視為基本的價值取向，通過教育使人贏得理性和獨立。因此大學成為人類社會的人才庫，思想庫，大學是獨立的思想中心。大學教育關注受教育者的發展，就不能表現的急功近利，一切都從經濟出發，造就工具化的人，這是對生命價值的忽視。國家應當視大學為一個獨立的機構，尊重知識的規律和教育的規律，不能把大學看成是一個經濟機構，否則，社會將失去自己的未來。大學首先是作為一個精神文化中心屹立於世的，而不是技術主義所理解的“人才工廠”。

運用法律保護大學的學術自由和學術自治。學術發展體現了大學對知識的責任，知識的責任是大學對人類社會責任的深刻而獨特的表現。國家作為世俗社會的強權，要為大學使命的實現設立法律的保護基礎。制定相關法律，劃定政府的管轄許可權，改變政府對高等教育的直接控制狀

況。引入市場機制，採用財政、評估、法律等宏觀管理方式，為大學整體社會目標的實現提供保障。自由的學術研究在推動知識發展的同時，對受教育者也有獨到的培養價值，洪堡將科學研究引入大學最初就是這個目的。理查·萊溫所說：“在學術事業中產生的知識決不是美國大學對經濟發展的惟一貢獻。通過使學生們從事智力型的調研、鼓勵他們對接受的學識提問、開發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培養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即通過教育大學也能對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大學在追求知識發展的同時，也要關注和參與國家的發展。由於知識經濟社會知識對社會、經濟的促進作用，大學已成為知識工業的重地，知識與經濟的結合，使得大學已自覺不自覺地成為社會的“服務站”。隨著社會發展的加速，過去憑經驗可以解決的諸如政治、經濟、科技、教育、環境、人口、國際關係等許多社會問題，現在都必須依靠高深複雜的知識和專業人才來解決，而大學正是獲得解決這些問題所需的知識和專業人才的最好場所。隨著社會競爭的加劇，社會機構及其從業人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知識，作為知識的生產者和傳播者，大學也必須主動地為滿足他們對知識的需要提供服務。這也是大學使命合乎邏輯的發展。發展不僅僅是對理想的追求，也包含著對現實社會問題的解決。而越來越多的複雜的社會問題和科技問題的解決，對智力的合作和國際合作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越來越迫切。大學不僅要面對人類的未來，也要面對人類的現在。只是不要在現實服務中使自身迷失了對人類命運深遠關注的崇高使命。目前大學發展中的不可持續性集中表現在對如經費、物質設備等有形資源的過分聚斂，對如社會聲譽、制度、管理水準、人的素質、價值觀因素等無形資源的過度開採和過度浪費上。大學要通過自身的改革，找到實現自身價值和使命的途徑。

大學至高無上之處在於給人們提供了機會：它給人們提供了改良文化、創造文化、延續生命和保障人類可持續發展的一個個人和智力平臺。這就是大學促進人類發展的使命，合理的大學國家生態關係有利於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

作者簡介：Pang Jinwei（龐晉偉）（1972—），男，寧夏銀川人，東南大學倫理研究所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倫理原理、教育倫理、管理倫理。

通信地址：龐晉偉，江蘇南京東南大學倫理研究所，210096